

内 容 提 要

现代中国三条道路三种政治力量的较量 and 竞争，结局各不相同，唯有中共获得成功。认识这一过程及其必然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蒋介石曾拥有种种优势，却失去了在中国成功的最基本因素——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终至失败。本文着重分析，蒋失去民心并非一种失误，而是由其政权性质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所决定的。

（二）中共几经重挫，1936年底剩3万多党员，此时距胜利不过13年时间，何以能在艰难条件下仍获成功，乃至800万蒋军也挡不住这一趋势？就与民众的关系来看，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无产阶级得到农民大众最有力的支持；党建立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人以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为己任，严以律己，无私无畏。人民从斗争中看到了希望，党则在斗争中获得民心。

（三）力求“独立”的中间派始终未能独立，却走向了分化。此结局并非其自身努力不够。原因在于：经济上软弱无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做或很少做群众工作”，不能提出正确的农民政策，未能形成中共那样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改良主义脱离民众，注定不能成功。

（四）三种结局证明，历史方向与人民意愿是一致的。中共的成功并非有何神通，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走到时代前列。1、党来自人民，并以人民为靠山。（周选P139）2、党从无所畏惧，唯独“就是怕脱离群众”。（刘选P397）正是这种对自身建设的严格要求和清醒的认识，使党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3、中共能量巨大，不仅仅因为它敢于为人民利益呐喊战斗，还在于它善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正确地反映人民的要求，体察人民的意愿和呼声。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强调这一点，正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论三条历史道路的结局及其与民众的关系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投入并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仅仅是一个拥有50多个党员的小党。当蒋介石1927年叛变革命并在全国建立起新军阀统治的时候，曾经一度发展起来的共产党剩下一万多党员。一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几经生死遭受巨大挫折的共产党人也只剩下3万余。这时候离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过十三年时间。究竟是什么使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仍然获得成功，乃至蒋介石的800万军队也抵挡不住这一历史的趋势？从现代中国三条历史道路的比较与分析中，可以看到，历史的方向和出路与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致的。不同的道路出现不同结局有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中国民心的向背是其中最根本的一条。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新的政治分野就开始出现。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仍是革命的力量，但作为一个悲剧性的屡战屡败的角色，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两大对立的阵营以帝国主义及大地主大买办为一方，革命的一方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代表中间势力集团。于是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三条道路的竞争和较量：1、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3、资本主义道路。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建立并控制中央政权达20多年之久，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都曾远远超过其他党派。但是蒋介石的道路没有能够走得通。他拥有种种有利的条件，却失去了在中国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占人口80%的广大农民的支持，终于败在共产党领导的小米加步枪的武装下。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政权失去民心，对于当政的国民党来说，并非只是一种失误、一种本可以调整或弥补的过错，而是由其政权自身的性质、由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所决定的。

第一，蒋介石政权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其经济基础，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①十年内战期间，仅以筹措军费为名滥发的公债就达26亿元以上。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其实力进一步扩张。至抗战结束，国统区的全部银行存款额中，四大家族控制的“四行”的存款额占80%到90%，与此同时垄断了全国的工商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但是依靠其政治特权，用超经济手段进行的掠夺，势必破坏社会生产，导致危机，以这种形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只能以丧失民心为代价。到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已经百业凋零，连宋子文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崩溃“这种现象或许在若干月之后可能出现”。②此时物价飞涨的速度竟达几万

倍以上。蒋管区不仅工农劳苦大众没法生活，就是小资产阶级、公务员也没法生活。美货滚滚来，入口大大超过出口，入口货半数以上为美国货。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南京政府的财政迅速破产，把国统区经济推向总崩溃的边缘。这时候，“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③一个被人民唾弃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得以维持的。

第二，为维护其经济与政治利益，必然要实行一党专政，压制民主，搞专制独裁统治。周恩来曾指出：蒋介石搞的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早在1931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就鼓吹，对于“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宣言”中竟宣称：“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所以要用以暴易暴的原则来实现中央强而有力的政治独裁主义。”④由于蒋介石的倡导，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宣传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狂潮。以法西斯主义为宗旨的各种学会、报刊纷纷成立和出版。一时间，法西斯主义大合唱甚嚣尘上。一些党徒被派往德、意等国家受训，同时一批德国法西斯分子被聘请到中国来担任国民党的政治、军事顾问。为维护其反动统治，蒋介石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所谓“以党治国，就是国民党治国”，“在革命没有成功，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不能允许再有第二个党攻击国民党。”⑤为了强化封建法西斯专政，在建立庞大的现代装备的军队的同时，还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特务网，对一切异己势力实行监视、控制、政治迫害直至逮捕枪杀。宋庆龄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中揭露说：“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枪杀，这就是他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⑥依靠强权，排斥一切民主的改革要求，只能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和离心力。而当伪装的“和平”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必然要借助于军事镇压。蒋介石当权期间，不惜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武力解决问题，这是由其根本利益所决定的。但是武装镇压的结果，迫使更多的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专制统治者既想维持其统治，又不能避免与民为敌，这就注定了最终走向失败的命运。

第三，南京政府丧失民心还由于其自身腐败所至。在连年战争中，大批官员大发战争财、国难财，日本投降后，趁接收之机，又大发“胜利财”。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这个数字实际上已被大大缩小，大量物资在接收过程中被隐匿、变卖和鲸吞。仅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就将价值五十亿元的敌伪物资出售，只收回三十亿元，其余则吞入私囊。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各显神通，竞相抢掠，大肆搜刮。“无数万的人民都曾为（抗战）胜利狂欢过，如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大家不得聊生。他们痛苦极了，比未胜利还痛苦。”⑦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不得不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象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丧失人心！”他认为：“政府因此而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⑧

由经济垄断而独裁，由政治独裁而发动内战，由为了在内战中取胜而不惜投靠帝国主义，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成为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这一方针是不可能改变的。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把历经长期战患的中国人民推向灾难和死亡的绝境。大规模战争使国民经济受到摧残性的破坏，

不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项事业根本无从谈起，而且造成田园荒芜，饿殍遍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无法维持，国人群起而反对之。对此，周恩来在1947年9月关于时局的报告中指出：“蒋管区经济破产、政治黑暗，到处表现出来。那里的人民运动象海潮一样，时起时落，反对蒋介石的日益增多，连大学教授、开明一点的绅士商人也会参加。”⑨历史走到了这一步，封建买办的官僚统治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二

（一）中国的百姓对旧政权失去了信心，人民渴望一个新社会的到来，渴望一个安定、和平、发展的年代，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具有十分迫切的土地要求。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国情出发，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曾经得到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从17到18世纪，“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⑩1905年，列宁就提出要把农民从以前的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后备军。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⑪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封建关系仍占有很大的优势，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困落后的根源，也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基本障碍。中国历史上的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基本目的都在于要求土地。1927年农民运动高潮中，“耕地农有”就成为当时广大农民的共同呼声，湖南、湖北的农民自发地起来没收分配地主土地。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农民曾三次起来要求土地，日本投降后，解放区人民在清算汉奸恶霸的斗争中，再次起来要求土地。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领导渴望土地的农民从地主那里夺回土地，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

孙中山一心为解决中国问题，曾提出过“‘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⑫这是因为四大家族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主，直接拥有大地产，是中国土改的主要对象。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就注意到农民问题，蔡和森鲜明指出：“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⑬这一时期，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澎湃、方志敏、阮啸仙等都参加并领导了各地的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指出：以土地革命为根本内容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战”时期曾一度出现“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好形势。1930年春，仅闽西地区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就解决了五十多个区五百多个乡的土地问题，连同新开辟的武东、汀南、平和地区在内，约八十多万人得到了土地。其他各根据地也先后有大批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农民从获得的土地上看到了希望，而中国共产党则在领导土地革命中获得了民心。抗战时期，从大

局出发改行减租减息，仍然激发起广大农民反侵略战争的积极性，解放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参军热潮，为抗战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也在抗战中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武装部队由抗战初期5万多人发展到127万，民兵达268万。而这些几乎都是从农民中吸收来的。这支队伍的壮大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与国统区一片凋零腐败的景象相反，各解放区在深入土地改革后，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支援解放战争，参军支前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潮。仅东北解放区，三年就有160万人参军。在华北，自日本投降后到华北全境解放，有近百万人参军。此外，无数民工以手工工具支前，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就有民工500余万人随军征战。仅平津战役，农民就出动了70万辆以上的大车。陈毅司令员用十分生动的语言概括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⑭可以说，没有农民大众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当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具有多方面因素，但是从中国特有的国情出发，争取了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大众的拥护和支持，无疑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旗帜的革命，它不但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且代表了其它各阶级人民的利益。这一革命所具有的爱国、进步的性质，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由此，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形成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革命斗争任务，党在实践中意识到“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因此工人阶级应联合各阶级引导群众做自由的解放运动”。^⑮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作了正确的分析，认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动力。从而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24年，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其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精神，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得“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⑯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农村斗争实践中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经济，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同时规定和执行了奖励私人经济，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并力争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实行领导的经济政策，这促进了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把中国革命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不仅可能取得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的同意，也可能取得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抗日战争后期，中共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顺乎人心，代表了全国人民意志，是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任务的正确途径。在中共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促成了全国军民的合作抗战，促进了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道路。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统一

战线的政治方针，并指示全党要“和人民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为此，除了在农村中实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还采取了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城市政策，得到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在党的领导下，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发展，并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这一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也为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从创立之始，就必须为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它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但具有严明的纪律和无私无畏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27年毛泽东就对秋收起义部队说明，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而打仗。抗日战争时期，又指出我们的党和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在长期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和军队规定了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民众的土豪劣绅、汉奸恶霸，到处得到人民欢迎。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经修改充实，沿用至今，使党领导的军队成为一支举世公认的纪律严明的军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强调，党在城市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入城的干部和士兵，均不得自由抓取物资，“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及时得到恢复和发展，各阶层人民与党政机关、入城部队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又及时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始终站在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使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衷心拥护。上海解放前久，陈毅要求在起草《入城守则》时写上“不入民宅。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上海市民清晨醒来，发现成千上万夜间进城的解放军战士抱着枪支整齐地睡在马路上，无不受到极大的感动。美国《生活》杂志撰文称解放军的这个行动，“宣告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①7}

1946年6月26日，原国民党谈判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对时局的声明》中讲了下面一段话：“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他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为此“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从危机中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①8}

这些情况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并不是偶然的。

三

在国共两党激烈对抗的同时，中国还存在着力求“独立”的中间派别。然而中间派别始

终未能求得“独立”的余地。五四以后，退居次要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各種活动。但是革命结果，民族资产阶级未能拉动中国前进的方向，自身却在激烈的斗争中走向了分化。

需要强调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结局，并非由于其自身努力不够。实际上，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都没有放弃过争取领导权的努力。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努力甚至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一结局之所以不可避免，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真正提出既符合人民利益，又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不可能真正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

首先，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际地位，决定了它无力担负起引导中国发展道路的重任。在经济上，缺乏足以与帝国主义经济、官僚垄断经济、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相抗衡的实力，因而难以避免被欺压受牵制乃至破产被吞并的命运。“中国民族资本在它积累的最高峰的时候，不过是七十多亿元（1936年币值），合二十多亿美元，而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达一百到二百亿美元，比民族资本大四倍至九倍。”^{①9}到解放前夕，民族工业所拥有的资本从抗战前夕的11.7亿元跌落到8.03亿元，而官僚工业资本却激增到51.2亿元，为民族资本的六倍多。^{②0}经济力量差别之悬殊，显而易见。不仅如此，由于民族资本结构的不合理，更使之无法摆脱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以及封建主义经济的依赖。这种难以独立发展的经济地位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软弱和不彻底性。甚至“国民党威胁一来，民盟有的领导人就表态宣布解散，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跟着丧失，从而也证明要想在国共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是失败了。”^{②1}

其次，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使其难以联系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也不能提出正确的农民政策，因此它未能形成象共产党那样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无法具有可与共产党相比拟的政治力量。民族资本不但与官僚买办阶级有着难以挣脱的瓜葛，与封建经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相当一部分自身就是从封建地主演变来的，有的仍具有双重身份。出于自身的利益，民族资本在其发展中，也希望压过封建经济，但最终没有勇气也不愿意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如民主建国会在其政纲中规定“在政策施行之际，一面须能切实解除农民之痛苦，一面仍须保障地主之合理收益；”^{②2}民盟的政纲中强调实行减租，“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之最高原则。”^{②3}这样的土地政策，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在实践中也行不通。由此可以理解，周恩来1948年指出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或很少做群众工作，”是由其经济地位及其经济政策所决定的。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一个致命的弱点。在中国，任何一种力量离开了农民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能成功，中间派亦不能例外。

第三，在两个中国命运的激烈较量中，中间势力也企望“唤醒并组织民众”，将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但是身处战争环境，却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实现其政治要求，“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制度，”注定不能成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根本利益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力大。”^{②4}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并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武装队伍。而中间派不能正视中国社会矛

盾的历史特点，提出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国共关系要由中间派来主持，使“右派向左，左派向右”，从而“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②5}中间路线最积极的倡导者，民建领导人之一施复亮明确指出：中间派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因此，中间派中有人指责“以武力争政权，是一种极大的罪恶。”^{②6}不难看出，中间势力是把希望寄托在国共双方都作出原则性让步的基础上，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种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的改良主义道路，甚至与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使用暴力起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相比，也是一种倒退。

实际上，如周恩来当年所说：“由于斗争的尖锐，特别是长期地处在战争中，使他们很难在国共双方阵线之外有多少活动余地。”^{②7}蒋介石政权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必然对民主党派实行分化、瓦解、打击、迫害。1946年6月以后，即大量封闭文化团体、言论机关、制造惨案，暗杀和绑架民主人士，直至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民盟被迫宣告解散。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中间路线走向了分化，中间阵营中，青年党、民社党投向了国民党，民盟的绝大多数及其它党派则宣布同共产党“携手合作，”为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四

三条历史道路的不同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反衬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

我们看到，不同阶级不同理想的人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然而历史本身却不是某一部分人随意选择的结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人具有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指挥历史车轮运转的神通，而是由于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风浪中，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趋势，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唯有共产党具有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独特之处。

第一，共产党来自人民，始终以人民为自己的靠山，方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胜利。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后，国内有些人高叫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失掉了，共产党也应该取消。但是共产党人郑重声明：“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②8}在长期艰苦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联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关系，共产党得以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中国共产党并不因为来自劳动人民，就认为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是天然存在并且始终如一的。面对着武装起来的强大的反动势力，共产党人从无畏惧过，但是斗争中却意识到，由于自身政策和策略的错误，可能脱离人民群众，这才是最危险的。解放战争时期大规模内战爆发后，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的说法很流行。共产党人对此有自己的见解。刘少奇在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足怕。我们根据马列主义分析的结果，知道它们要死亡的，无产阶级硬是要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我们没

有什么可怕的，这是从总的方向来说的。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战争年代，党在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曾出现过这样那样脱离实际，违背群众利益的错误，但是都得到了纠正。斗争实践使共产党人懂得了，越是取得重大的胜利，越是不能忘记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也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特点。共产党人懂得：“我们和群众是有联系的，但是还不够，要说已经联系得够了，工作做好了，那比一万美国军队还可怕，因为不再要求不断巩固扩大同群众的联系了。甚至有人说，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这就比一百万美国军队更可怕。”^②基于这样的认识，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几经重挫都能够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使自身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

第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中只是一小部分，但之所以能发挥巨大能量，不仅仅因为他们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呐喊战斗，还在于他们善于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正确地反映人民的要求，体察人民的意愿和呼声。这也是共产党人高出其他政党之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③八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是要和平，不要内战。共产党尊重人民的意愿，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努力。于是才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当蒋介石一再撕毁协议并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后，共产党提出的仍然是自卫口号而不是进攻口号，因为人民中仍有一部分人不相信战争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指出：“如果我们那时就提出打倒蒋介石，他们就会不相信，不接受。”^④一直到内战爆发第二年，蒋介石打不赢战争，又干了许多蠢事，从而完全失去民心，而共产党又被证明有力量取胜时，才提出了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而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大加速了蒋介石溃败的进程。

三条历史道路三种结局，唯有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并开辟了新的前程。历史本身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激烈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中，谁代表了人民，谁就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人民群众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带领下，才能走上解放的道路；同样，无产阶级先锋队倘若失去人民的支持，则将一事无成。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历史同样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再次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正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7页。

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0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6页。

④《中国现代政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八册。

⑤蒋介石：《我们为什么入党和以党治国》，载《蒋介石全集》上册。

⑥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⑦《大公报》，1945年10月24日。

⑧邱毓麟：《胜利前后》第76页，第87页。

- 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9页。
-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2页。
- ⑪《列宁选集》第1卷，第591页。
- ⑫《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4页。
- ⑬《蔡和森文集》第766页。
- ⑭谭震林、栗裕：《光明磊落、革命一生》，《人民日报》1977年7月29日。
- ⑮《响导》第20期。
- 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5页。
- ⑰转引自田耘生：《认真完善政策，坚决端正作风》一文。
- ⑱《张治中回忆录》（下）第850页。
- ⑲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
- ⑳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34页。
- ㉑《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4页。
- ㉒、㉓《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第238页、第68页。
- ㉔《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 ㉕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
- ㉖《应该问问人民》，1945年11月15日南京《大公报》。
- ㉗、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4页、第139页。
- ㉙《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97页。
- ㉚《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
- ㉛《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4页。